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汽车里的奥赛罗

满心欢喜地奔赴渺茫的人生

“濯足”之后费思量

钢琴家语录

那些沉默的书局

简·奥斯汀的骄傲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夏佑至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言 一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4年1/2月 第8卷第01期

总第72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2013年以前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2013年各期精排版“独立阅读”均可在多看阅读免费下载：

www.duokan.com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从昆明砍人到马航失联，三月动荡不堪；相比之下，西安幼儿园病毒灵事件较低的关注度实则暗示着一个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如何为其命名的时代：城市或者说现代的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人们也将越来越多地遭遇由此而来的如影随形的风险。风险本身亦恰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心有余悸所导致的关注度会渐渐促使人们去了解风险，掌控风险。然而不幸的是，身在大陆，最大最难掌控的风险莫过于病毒灵事件这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

如果说阅读对于消化与理解昆明，马航事件尚且有所助益的话；那么，病毒灵事件这一类风险的防范，恐怕就只能实践里面出真知了。



目录

封面用图
the red list
andrew wyeth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005-012

文 史 • 王晓渔
小 说 • 朱航满

书评

• 凌 越
汽车里的奥赛罗

• 戴新伟
满心欢喜地奔赴渺茫的人生

013-020

随笔

• 刘 柠
“濯足”之后费思量

• 马慧元
钢琴家语录

• 成 庆
那些沉默的书局

• 罗四鸽
简·奥斯汀的骄傲

021-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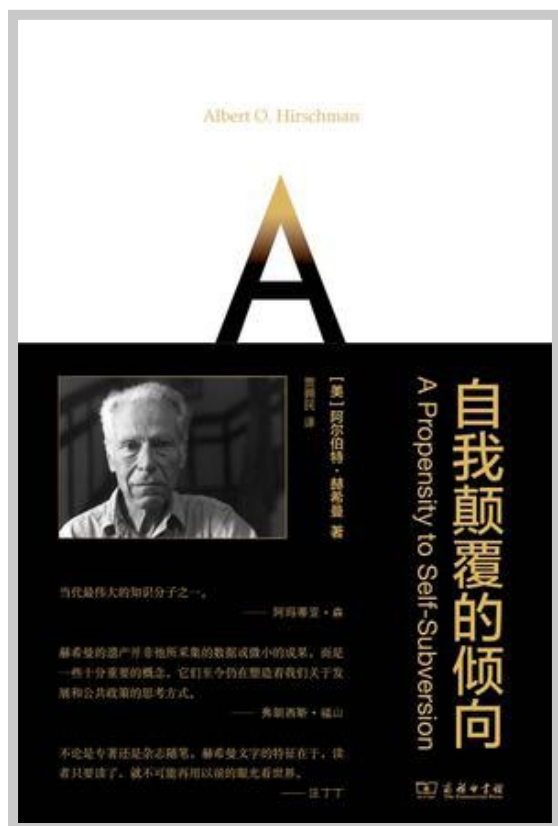
王晓渔

无孔不入的雾霾，比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更能让人们感受到移民的迫切性。是否移民，是个人的选择和权利。尤其在国民沦为环境难民的情况下，移民无可非议。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民众表达不满的方式只有移民，这个国家会不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压力继续停滞不前（或者说“稳定压倒一切”），陷入一切沉寂（或者说“和谐”）？当波兰处于极权主义的时候，米奇尼克写过《你为什么不移民》，他肯定流亡者的作用，但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移民，愿意留在国内坚持反对的立场。后来波兰的转型，与米奇尼克们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美国学者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退出”和“呼吁”往往背道而驰，尤其“退出”会侵蚀“呼吁”的根基，因为“与退出相比，呼吁需要人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按照这个理论，加拿大政府宣布中止投资移民，倒也不尽然是坏事。不过，赫希曼在《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里对自己的这个理论有些校正。通过对东德转型过程的考察，他认为“退出（迁移离开德国）与呼吁（针对政权当局的游行示威）是相互协同、相互强化的，共同导致了原东德政权

的崩溃”。在1949至1988年，移民缓解了东德内部的压力，东德当局甚至会驱逐很多精英出境。1989年形势发生变化，“我要一直留在这里”代替了“我们要出去”，接着成为“我们要一直留在这里”，所有东德民众汇集在“我们是人民”之下，最终这个口号又变成了“我们是同一种人”，促成了东西德的统一。这一年柏林示威的两大主要诉求是“自由选举（更强大的呼吁）和自由迁徙（自由退出）”。柏林墙的倒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了中东欧的巨变。越过柏林墙是为了“退出”，最终成为“呼吁”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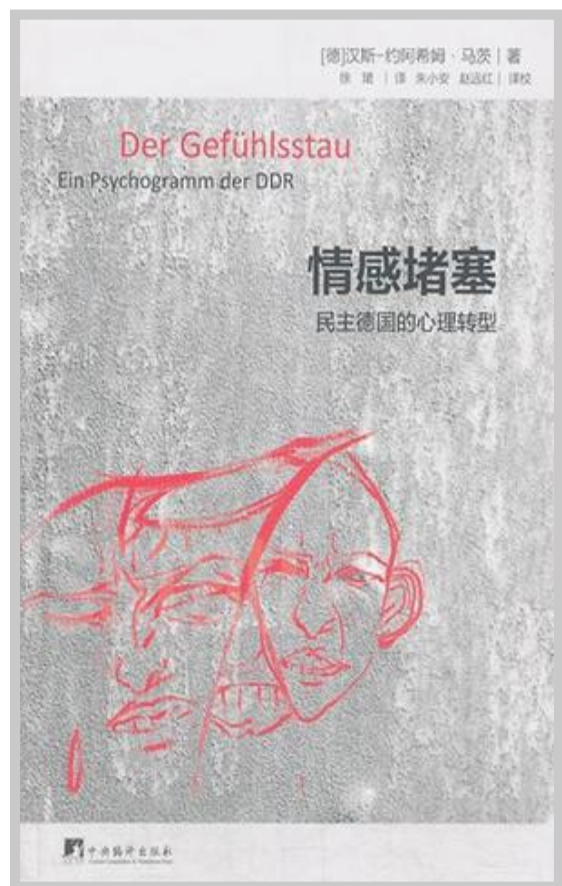
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到很多洞见，比如：



“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赫希曼指出，那些口口声声“时机仍未成熟”的政客，“事实上并不想推进公共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据他们说，很‘不幸地’，这些改革必须无限期地向后推迟）”。

阅读赫希曼的著作，需要全神贯注，他提出一个观点，当你被他说服时，他却对此提出质疑，又提出一个修正后的观点，当你再次被他说服时，他再次提出质疑，仿佛不断升级打补丁的电脑程序。他认为“自我颠覆”有助于形成“更民主的文化传统”，“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赫希曼把这本书献给莱佩尼斯（又译为勒佩尼斯）夫妇，此前“独立阅读”曾介绍过勒佩尼斯先生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和《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李焰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值得再次推荐。

曾经在东德生活过的心理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徐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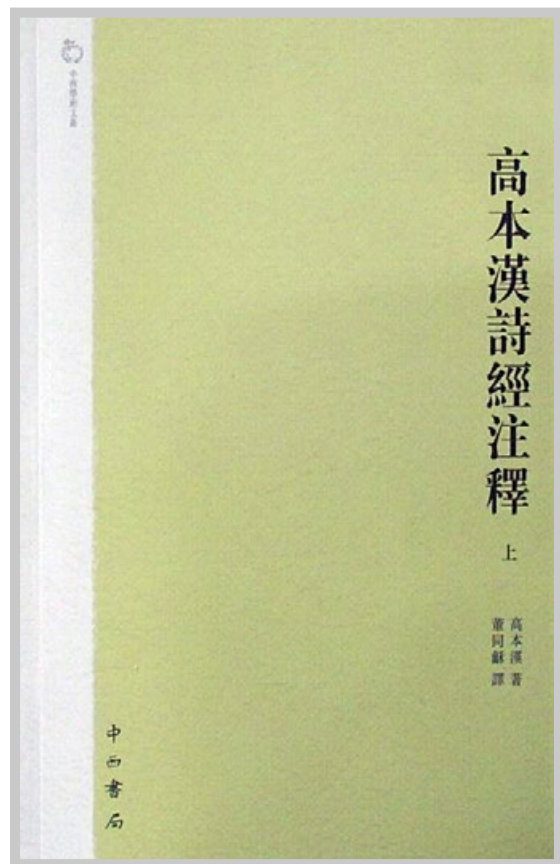
11月）里对像雾霾一样无孔不入的压制性体系做了深入分析。相比柏林墙的倒塌，相比政治转型，心理转型更加艰难。电影《再见列宁》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东德民众在转型时的心理症候，儿子担心病后初愈的母亲不能接受变化，制造出一切都没有变化的幻象，母亲意识到变化，却没有点破。有些荒诞的是，不少观众没有注意到电影中的暗示，认为母亲是“怀旧”的，把《再见列宁》理解为“缅怀列宁”，这就有些南辕北辙了。

暂且不说各种国家机器直接的压制，只以体育为例。马茨讲到，当时东德只有一个领域堪称“伟大”，就是体育运动，公众对此态度非常复杂，是一种介于自豪和反感之间的矛盾情感。公众反感把体育变成政治宣传，对国家政策也有很多不满，但又对国

家的国际形象非常在意，认为体育与政治无关，为“体育强国”自豪。同时，运动员的成功之路又给无处释放能量的国人提供了一些“希望”。书中讲到一个细节，东德运动员在任何地方都要不停地感谢“领导”。这种故事在其他地方还在延续。2010年冬奥会，周洋在夺冠之后首先“感谢父母”，引发体育官员的批评，认为应该首先“感谢国家”。2014年，周洋再次在冬奥会夺冠，首先“感谢习主席”。

“蓄积的侵略性，强迫为奴的恐惧不安、权威依赖性和从属性，甚至是些具有微小危险的对自己或他人的攻击性”——这是马茨以患者同时也是以医师身份感受到的内心状况。他接着指出一个更悲剧的事实，东德的精神疗法本身就源自斯大林式的专制。这意味着，这种精神治疗只能加剧心理危机。如何疏通堵塞甚至淤积的情感？马茨主张通过诚实与坦率、意见争论和批评性分析来创造“治疗文化”，而这些与“政治上的民主和公共话语中思想意识的多元化”有关。

讲到转型，无法略过台湾。台湾不只有小清新，更有“回看血泪相和流”的历史。此前许倬云的《台湾四百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里不做推荐。一套三本的《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陈翠莲、吴乃德、胡慧玲著，新北：卫城出版，2013年10月），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百年台湾的历史，尤其是政治转型史。这些年，大陆读者开始对二二八事件、



《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案、江南案、野百合学运等事件略有所知，但依然雾里看花。对蒋经国过于高度的称赞即是一例，仿佛蒋经国宣布解严，民主就从天而降，因此期待未来的蒋经国，即使没有也要假想一个。但是，在蒋经国宣布解严之前，台湾民间的努力可以用“前仆后继”形容，没有这种压力，天使也不会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

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里，美国律师艾伦·德肖维茨认为权利不是来自造物主，也不是来自自然，甚至不是来自逻辑和法律，而是来自极端的邪恶。这样说不是要把“丧事办成喜事”，德肖维茨的用意在于，人们对何谓完全正义难以达成共识，但不应

因此忽略明显不义的恶行，也不应使支持或施加恶行者退守到道德相对主义里。此前“独立阅读”介绍过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书中有相似的观点：需要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

这种视角的转换非常必要，你可以说保护私有产权会导致问题重重，比如一些公共建设因为关涉个人的私有财产而进展缓慢，关于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可能会有永恒的争议，但因此推出强拆是可以接受的，就有些荒谬了。“完美的公正”像乌托邦一样具有危险的诱惑：首先，关于“完美的公正”，几乎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其次，即使可以达成共识，“完美的公正”也只存在于理念之中，一旦应用到实践层面就像“反面乌托邦”那样惨不忍睹。所以，德肖维茨倾向于“将权力体系建立在公认的恶行而非理想的完美境界之上”，“权利来自于人类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这是一种反乌托邦而非乌托邦的思考路径。

但是，极端的恶行是否一定能够唤醒权利意识？这是需要存疑的。如果一场暴力事件出现之后，拒绝反思暴力的成因，

反而主张加强新闻审查以限制不同观点的传播，越过法律程序以严惩犯罪嫌疑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暴力的无限循环。只有暴力的同谋者，才会如此拒绝反思暴力。因此，从恶行推导出权利，需要有开放的言论空间作为保障。

上海的百家出版社改组为中西书局之后，焕然一新，“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均可圈可点，只是常常藏在深闺人未识。《高本汉诗经注释》（董同龢译，中西书局，2012年10月），出版后一年多我才注意到。瑞典学者高本汉的注解，经过音韵学者董同龢的翻译，使得诗经具有了现代诗的魅力。比如《国风·邶风·旄丘》有“流离之子”之说，按照朱熹的解释是“流离失所的孩子”，但是毛传认为“流离”是鸟名，此前有学者认为是梟或黄鹂，高本汉直接把这句理解为“流离鸟的孩子”。

《国风·邶风·新台》有“新台有泚”之说，高本汉从“泚”是鲜明的意思出发，指出《孟子·滕文公篇》中“其颡有泚”，此前被解读为“他额头上有汗”，原来的意思可能是“他额头上有发光的潮气”。这种富有诗性的解读，使得这本专业气息浓厚的书也变得容易亲近了。Q



春节回老家，亲友相聚，最亲切的一个话题，便是一起回忆走过的旧时光阴。许多细碎的往事，逐一涌上心头。那一刻，真是令人温暖，也是令人忧伤的。毕竟往事不可追，岁月又太匆匆，不但改变了我们的容颜，甚至连我们生活的周围一切，都变得愈发令人感到陌生。春节后，读了叶广芩的中篇小说《太阳宫》（《当代》2014年1期），便又想起了旧日的故乡，也想起了诸多的往事与记

忆。有许多精微的感受，乃至细密的体察，甚至连自己都忘记了，但一篇好的作品，仿佛又能瞬间让它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叶广芩的这篇小说，便是对我们旧日时光的一种致敬。其实，丢失的记忆，通过打捞可以得到补救，而曾经拥有的生活形态，以及感受过的世界色彩，却真真地再难以触摸和追寻了。小说写一位人至年迈的医生，由于北京城的急速扩建和拆迁，使其迁居到了京城郊区的太阳宫附近，而这个本为郊外却已高速发展为现代化的地方，勾起了她的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

如果不是因为虚构，这篇小说真是颇像一篇忧伤的抒情散文。故事真的很简单，却别有一番韵味。它写到了儿时与母亲一起去太阳宫的乡下走亲戚的记忆，而这乡下亲戚乃是母亲的妹妹一家，但又根本不是母亲的亲姐妹，然而，母亲和“我”的到来，却得到了他们最热烈的欢迎。“我”在那里结识了儿时的伙伴日头，并度过了难忘的乡居时光；此乃小说的上半部，作家精描细绘，写乡人的质朴、热情，写乡间的自然、优美，也写儿时伙伴的活泼、机智，令人读后难忘。小说的下半部，写儿时的伙伴日头和父亲进城的情景，但相比小说写乡间的美妙，进城的情景却全然是另一番的景象：大城市的富足与复杂，城市人的算计与势利，而天公也不作

美，竟是连日大雪飘飞，日头和父亲去雍和宫去看一年一度的“捉鬼”，却也不幸染上了疾病。在叶广芩的笔下，与对乡村的歌吟所截然相反的是对城市的不满。甚至也因这次“进城”，而最终导致了日头一家不幸的连锁反应，先是日头染病给他的父亲，竟导致了父亲的亡故；随后日头母亲改嫁，又终跳河死去；日头在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不幸被俘，从此杳无音讯。

表面看来，在作家叶广芩笔下，居住在太阳宫的日头一家，因为一次“进城”的缘故造成了他们一家的悲剧。由此，作家还强调了母亲与日头一家原本非亲非故的因缘，使得小说更添了几分悲欣交集之感。其实，城市以及城市人只是一个象征，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种借城市来表达对于现代化急速发展的质疑和批判。因为正是这种对于现代化的向往、追求乃至焦虑，从而造成了许许多多不可挽回的结局。诸如从小的方面来讲，作为儿时的伙伴日头，他对于城市人的羡慕，以及对去城市能看到“捉鬼”的渴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现代性的向往，而这种羡慕与渴望，竟连锁性地导致了日头一家人命运的直接改变；再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化城市运动的扩张和发展，又导致了日头的家乡太阳宫作为乡村世界的消失，同时也更是直接促使了那种记忆中最朴素、自然和美妙的乡村风物的消逝。

小说《太阳宫》见微知著也。它由一个乡村家庭的消失和一个乡村世界的消逝，表达

了作家叶广芩对于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深切的忧思。日头及他的家乡太阳宫的命运，或许可以看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挽歌式的咏叹。曾几何时，我们向往快速，追求方便，渴望一体化，更急于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与变革，希图立即得以富足与强大，却不想，那种值得享受的缓慢，应该拥有的繁难，以及难以复制的独一无二，还有那些隐藏在传统中的美好与纯粹，都一并被我们统统地遗忘、丢弃乃至丧失掉了。可以说，《太阳宫》是一篇忧伤的怀念之作，更是一篇抒情咏怀的忧思之作。

记得有位作家曾感叹，好的文章写到最后，就像写高难度的学术论文，愈来愈复杂，也愈来愈智慧，由此，写作者和读者才会获得一种满足的文字享受。由此想到，好的小说写到最后，或许就像是做超难度的数学题一样，作家需要设计一个系列复杂的运算步骤，而且得出的答案还往往不止一个。范玮的中篇小说《太平》（《当代小说》2013年12期）便是这样一篇让人读来兴奋的“好看”小说。简单来说，这篇小说可分为两个线索，一个是“我”和自己的女上司小白的故事，一个是“我”所讲述的关于太平这个地方的故事，这两个线索平行推进，却互相缠绕，彼此影响。“我”最终因为向曾招募自己进公司的女上司，也就是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小白，交代和讲述自己失踪四天时间的经历而真正赢得了她的爱情，而小白的聆听与参与，也影响了“我”有关太平故事讲述的节奏

和方向。这篇小说的内核是“我”去太平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又分出两个线索：一个是“我”的父亲与他死去的朋友于勒的友情故事；另一个则是于勒与太平邮政局女职工张映红的爱情故事。这两个故事都被作家书写的扑朔迷离，最终前者有了答案，而后者的谜底始终没有明确揭晓。

关于去太平的故事，又有一个内核，便是父亲的好友于勒的死。我是十五年后带着父亲的这个疑问去的太平县，而在太平的整个过程，也便是围绕着弄清于勒的死来展开的。实际上，于勒是与张映红一起死去的。由于女上司和情人小白参与了故事的讲述，造成了“我”的叙述重点由于勒的死，变成了有关于勒与张映红的爱情故事，以及对于张映红身份的追问。在“我”的讲述中，有关张映红身份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式的叙述。为此，

“我”分别用了警察、赌徒、六姑、旅馆胖老头、广场上的疯子青年等几个人的追忆，来完成对于张映红的塑造，也才逐渐将这个碎片式的爱情故事补充完整。在警察的眼中，张映红是一个妓女，因为嫖资的问题杀死了于勒；在偶然偷窥了杀人过程的赌徒看来，张映红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因为争议乃至意见不合而最终意外杀人；而在旅馆胖老头的眼中，张映红是个害人精，硬是把一个浪漫潇洒的于勒给折腾死了，甚至不顾惜自己的形象；而对于张映红的六姑，一个因为暗恋而终身未嫁的老女人来说，她的侄女却是一个为了爱情的尊严而敢于牺牲和坚守的烈

女子；但对于广场上的疯子，这个因为被恋人抛弃的年轻人，张映红则是父亲和于勒一起追求和互相较量的猎物，虽然最后他们都是失败者。

关于父亲和于勒关系的破裂之谜，在“我”的故事讲述中逐渐清晰。父亲作为张映红的追求者，在醉酒后希望于勒放手，而父亲作为太平县的粮食所所长，多年来施恩给于勒这个外来的流浪汉，但却使得后者产生了一种被人利用和算计的耻辱感；而于勒的死，“我”在讲述中虽并没有详细交代，但通过整个故事的讲述可以推算，大致应该是这样的：于勒在知道父亲对于张映红的多年暗恋之后，向情人张映红告白，希望这个女子能够与好友结合，但遭到为于勒付出巨大牺牲的张映红的激烈反对，最终双双殉情。这个推测，符合胖老头对于于勒的



想象，乃是大度，讲义气，知恩图报；也符合六姑对于张映红的想象，侄女维护了爱的尊严，却绝不愿去做交换的礼物；而张映红的气急败坏，也显然符合赌徒所偷窥到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给情人小白的讲述中，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根据小白的要求，“我”作为文学爱好者，冯古内特小说迷，可以采取小说的手法来讲述故事，于是“我”在讲述中便尽可能地采用各种现代小说叙事，使得这篇小说的叙事复杂精致；二是“我”因为与小白同在一个公司，故而“我”的讲述，大部分主要是依靠网络交流工具来进行，由此造成了整个故事的叙事极为简洁和破碎，甚至被时常打断，甚至因为这种虚拟的交流手段，使得故事的发生也有一种虚幻和鬼魅之气。Q

汽车里的奥赛罗



凌越

《迷狂》这本小说自始至终几乎定格在一个画面上：雾气蒙蒙的十月的夜晚，一辆大型沃尔沃汽车在群山环抱中在树枝弯曲交错的大道上穿行，伴着飒飒风声。人物只有两个，正在开车的是一位四十九岁的女人埃斯特，她有着丰满的身体、黑色的宽脸盘，坐在后座上的是五十五岁的大学教师沙乌尔。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沙乌尔的左腿从脚踝粉碎性骨折到膝盖，正压在一只陈旧掉毛的靠垫上。他们时而交谈时而沉默，只是偶尔通过汽车里的后视镜相互观察一下对方。

这貌似寻常的生活场景，由于车内两个人物暴风骤雨般的内心活动逐渐变身为梦魇，而那辆在暗夜里穿行的汽车则成为冲破日常生活藩篱以及人性圆形囚室的象征。和许多杰出的后现代小说家一样，格罗斯曼放弃传统小说家高屋建瓴的宏大叙述视角，——对于格罗斯曼来说这其实并非易事，大屠杀、巴以冲突等主题或深

或浅地萦绕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而格罗斯曼更著名的小说《证之于：爱》和《走到人类尽头》都是政治意味浓重的小说，而《迷狂》却剔除一切政治因素，试图让语言和人性的主宰一切，——把手中的望远镜换为放大镜，凑到事件和人物的近前仔细观察。他们的信念是，只要足够细致地呈现事件、事物本身的肌理和脉络，那么这些被带电的语言激励的细节会自动找寻到一种既飘忽又丰富的意义，而后者闪烁不定的身影里其实蕴含着作家们所渴望的真相，也许这真相并不清晰并不黑白分明，但是他们知道真相无法脱离暧昧的灰色状态而存在。在这样的小说中，精微和晦涩往往相伴，简单的情节收缩为充满能量的核——为语言丰富的意旨腾出了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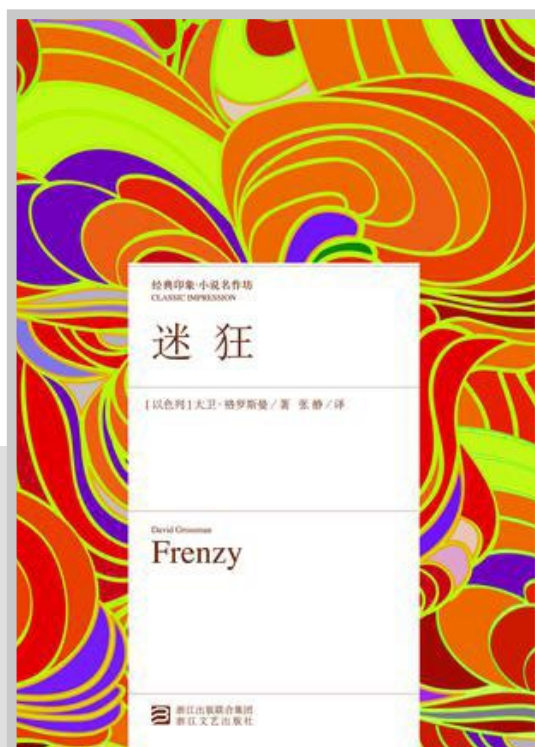
在《迷狂》中，故事的情节多是通过人物的述说和内心活动带出，因为沙乌尔正处于对妻子外遇极度郁闷的狂想中，他纷乱纠结的内心使他的述说充满了摇摆不

定的歧义，也就顺便对应了现实实质上的暧昧不明。许多事实在小说里并没有得到澄清：这辆破旧的沃尔沃车将驶往何处？沙乌尔的妻子艾莉舍瓦真的每天抽出一小时和情人约会吗？而那位情人保罗确有其人吗？沙乌尔的腿是怎么受的伤（小说里沙乌尔的解释是：我开车回家，我撞进了人行道。但随后作家就以埃斯特“打开收音机以驱散他沉重的谎言”来反驳）？他跟踪过艾莉舍瓦吗？沙乌尔的述说是基于倾吐衷肠还是引诱？所有这些，小说里要么根本没有提及，要么就在刻意回避。格罗斯曼很清楚，他的目的决不是清晰流畅地叙述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清晰的情节反倒有可能破坏他对于人物迷狂内心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他无法获得他所渴望的事物内在的真实以及词语内在的真实。

受伤的刺痒的腿，车窗外雾气浓重的黑夜，后视镜里埃斯特神秘莫测的表情，正从嘴里倾吐而出的妻子外遇的隐情，所有这些使得沙乌尔的叙述带有一种奇特的梦幻色彩，他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紧张与放松不时交替，仿佛承载着某些无穷无尽的内在激流”。这样的语言交流显然强化了汽车里怪异的气氛，另一方面，埃斯特作为沙乌尔的弟媳这一层关系，则进一步造成这种不自然的别扭的氛围。在这犹如没有紧紧咬合的齿轮相互生硬的碰撞中，沙乌尔内心的迷狂通过支离破碎的语言，通过汽车内越来越紧张的气氛成功地传递给驾驶座上的埃斯特。她从最初的平静渐渐变得晕眩以至于激动，因为“躺在她后面的那具身体放射出温暖，因为那具身

体的内部似乎正在被撕裂”。

埃斯特的回忆之流逐渐被带动，“她深深吸气，吸到她体内的一块还炽热的余烬，它被小心地掩盖在一堆冰冷的炉灰下面，能感觉到它发红，小小的火焰在闪耀。”——她想起了自己被一堆巨大庸常的碎屑淹没夯实的生活，想起自己的五个孩子，想起丈夫麦卡（也就是沙乌尔的弟弟），还有她深深埋在心底的青年时代的恋人哈该，从他那里她曾获得了最饱满的激情但却从未对人透露过。显然，在沙乌尔真假莫辨的叙述带动下，一条回忆之缝正在埃斯特貌似幸福的生活中悄悄变宽扩大，那是所谓的生活的真相吗？埃斯特甚至不敢去正视它遑论承认它。埃斯特作为倾听者，她逐渐失态的言谈举止（猛



《迷狂》（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著
张静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然停车趴在方向盘上，颠三倒四地回应，后视镜里更趋频繁的眼神交流），从反面激发了沙乌尔倾述的热情，他说得更多更细致，或许因此会显得更不真实？但没关系，汽车内迷狂的火焰已经越燃越旺，沙乌尔和埃斯特最终的拥抱已经可以预期。语言之流——哪怕是虚假的语言之流依然可以改变事实改变世界，这是格罗斯曼想说的话吗？

为了对应人物情感上的迷乱状态，在叙述方式上，小说人物的交谈和回忆交织，回忆的情景往往在一行字之内就已经嫁接到现在时的车内，过去和现在在语言之流中自由出入，人称转换也非常灵活，甚至在一个句子里人称已经几易其主。事实因而被翻转，语言和想象力开始显现他们的威力。这样的手法增添了阅读的障碍，但却更形象地刻画出小说人物内心的恍惚、不安和纠结。另一方面，小说人物的迷狂之心也激活了语言本身，小说词语因而摆脱了工具语言迟钝的根茎，在漂浮中在和小说人物恍惚的邂逅中赢得了自己的生命。

在表现心灵的迷醉方面，语言似乎总是那么跃跃欲试，试图一展身手，这次在《迷狂》中也不例外，漂亮的语句比比皆是，这正像埃斯特从沉闷的“幸福”的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在“危机中”整个人反倒焕发出生机和光泽。这是书中的两段：“现在，似乎由那里伸出来的触须又将她聚集在了一起，而她再也无力抵抗。她跳进一眼由气味、触摸、潮湿和图像碎片构成的漩涡，那些在夜里侵扰过她的梦的记忆，



作家格罗斯曼

她在自己体内新发现的岛屿，自那时起就被孤立的岛屿——”“埃斯特开得很慢，感觉沃尔沃似乎没有在移动。看上去仿佛环绕着他们的巨大的群山在向着黑暗延伸，然后被缓缓地推平，向后退成为平原，接着又被新出现的平原吞噬。”这些诗歌般优美的语言和书中复杂的主题相得益彰，小说的境界亦随之而被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终究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其主题开掘的深度、人物的生动往往和美妙的语言相对应，而《迷狂》在此方面堪称不可多得的佳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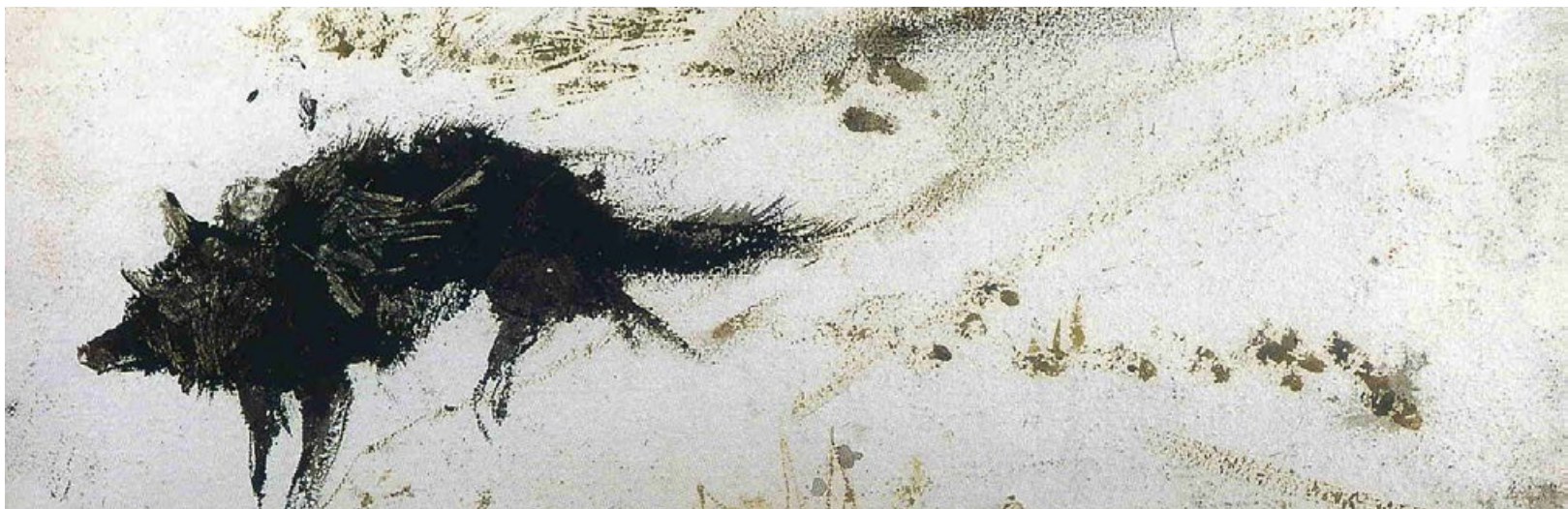
说到底，《迷狂》是一部探讨人类激情的小说，而男女之间的性嫉妒大概也是人类激情中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一种。在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奥赛罗》中，摩尔

人奥赛罗因为坏人伊阿古的谗言，在盛怒中将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妻子苔丝狄蒙娜掐死，当他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又在妻子的尸体边自刎而死。这样的悲情让无数读者唏嘘不已，但人性之恶如何可以杜绝？甚或人性之恶的存在仿佛是人性之善的显影液，没有恶的激发，善也就无从诞生。《迷狂》里的沙乌尔堪称现代版的奥赛罗，他忍着腿伤的剧痛在汽车里长吁短叹，他的嘴唇为了一个幻想的亲吻而收缩。对妻子的性嫉妒迷乱了他的心神，在恍惚中在和自己弟媳紧张的语言交流中，长久以来压在生活厚厚的尘埃下面的心愿、渴望似乎终于慢慢呈现出来。一切都被黏稠的情感所玷污，一切似乎只能在“一吻里收场”，其情感的强度直追他的“前辈”奥赛罗。

但和莎士比亚笔下因悔恨自杀的奥赛罗不同，《迷狂》尽管整部小说调子灰暗，就像小说主要意象——一辆在黑暗中疾驰的汽车所带来的阴暗氛围，但格罗斯曼在结尾保留了一抹罕见的亮色，最终埃斯特和沙乌尔在情感的悬崖边撤回。埃斯特用后背挡住了那间有艾莉舍瓦的小屋，“艾莉舍瓦在她的床上翻腾，跟一个男人，也许是两个，也许是世界上所有的男人。”——这些都不再重要，因为沙乌尔毕竟虚弱地说：“我想我们该回去了。”这里的“我们”明白无误地指向他和埃斯特。嫉妒的激情终究会被另一种激情——同情——所救赎？对此，格罗斯曼显然有所期望却并不肯定，因为在书的末尾，当沙乌尔和埃斯特再度启程，他们仍然不知道去往何处？

满心欢喜地奔赴渺茫的人生

——重读《小城畸人》



戴新伟

在《发现父亲》这篇随笔里，舍伍德·安德森非常不喜欢他爹，太失望了，他爹完全像个快活的小丑生活在街坊邻居之间，夸夸其谈，一点也不在乎出洋相，简直丢尽年幼儿子的脸面。这个爹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个失败者，破产后全靠安德森的妈妈做工养活全家，而且经常在外面无所事事地游荡。

一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以至于少年安德森不得不痛苦地幻想其实他的父亲乃是一位经理或者国会议员。直到一天晚上父子俩在黑雨夜里游水，那天晚上仪式般的经历让安德森完成了一个男孩向男人展望的重要一步。他在文章结尾说：

“平生第一次，我毫不含糊地确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就像我今后要做的人一样。”

舍伍德·安德森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讲故事的人，而且是“会讲故事的人”。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的扉页上有献给他母

亲的献辞：“母亲对周围生活的锐利观察，首先在我心中唤起了，透视生活表层之下的渴望。”

为什么要献给母亲？当他和父亲游水回来，母亲微笑着问：“你们两个男孩子干什么去了？”

是父亲的行动力，但也更是母亲的眼光释放了受困的少年安德森。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种生活的经验和智慧（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覆盖了他，使他应付自如，一如那个黑暗的晚上奔赴水域，把曾经街道上邻里间的烦恼留在了岸上。有一段时间当我重读《发现父亲》这篇随笔时，觉得安德森的父亲是一位作家，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批评家，这使得我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作家像是具有压倒其他作家的重量和解释能力。

英文矮脚鸡版《小城畸人》，232页，是在一家外文书店打折买的。促使我买这本英文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是，封面正是我

的偶像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那幅著名的画“Christina's World”。我尝试着每天读一点原文,唤起了我某种幼年时代在黑暗里咀嚼糖果——来之不易的糖果——的愉悦,那种味觉难以言表。

《小城畸人》,上海译文1983年的中文译本,吴岩译,印数3万册,定价0.85元。好久远了,我第一次读它竟然是20年后。那次午后聊天,有朋友提到她先生每年固定读一遍的书,就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几个小时后我去旧书店溜达,一头撞见了。我风尘仆仆,它一丝不苟。就是这么巧。那是我或者成都的好时光,还能容得下这样的机缘。真正读它也很偶然,只记得最初的感觉——味觉,像童年时代的某种野菜,有些生涩麻木,一点也不快乐。像开篇那样的布局,老套得如同章回小说之楔子,更如同日本狂言,正正经经先来交代场地布景,人物该从哪处方位上上下下。四篇《虔诚》,看得人头大,直到《没有说出口的谎言》,直到雷·皮尔逊的故事,我才知道一切何等真实,一切何等难忘。

农场的两个长工,一个雷·皮尔逊,一个黑尔·温特斯,二十二岁。作为一个在温士堡出了名的浑球,这天黑尔向雷讨主意,问自己要不要同一个女人结婚,因为“他害她难做人了”。

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讨这样的主意,不外是在女人那里欠了一笔风流帐。五十岁的雷,这个老长工一下子无法回答,而黑尔倒是心里坦然,没事一样进城去“咸肉庄”狂欢。雷继续做完杂事,跟着老



婆回了家——一家是那样的:孩子在叫,老婆在吵,还沉浸在黑尔故事里的雷站在田野上,很显然,人生的意外——即使是别人的,也唤起了他身上某种神奇的力量。

在那一个秋天的晚上,温士堡附近的乡村美景,对于雷是太诱人了。只是如此而已。他简直无法消受。突然,他忘记了作为一个安分的老长工的一切本分,丢下破烂的大衣,开始奔过田野。他一面奔跑,一面喊出了抗议,对于他的生活,对于众人的生活,对于一切使人生丑恶的东西的抗议。“没有约定的诺言,”他向着展开在他面前的空间叫喊,“我什么也没有允诺我的明妮,黑尔对内儿也不曾作过什么诺言。我知道他不曾。她同他到树林里去,是因为她要去。他所需要的也就是她所需要的。为什么我要作出牺牲?为什么黑尔要作出牺牲?为什么有谁要作出牺牲?我不要黑



尔衰老和心力交瘁。我一定要告诉他。我不愿听之任之。我要在黑尔到达城里之前追上他，我一定要告诉他。”

这是何其动人的描述——你想想雷这个老家伙奔跑在暮色田野上的歇斯底里，不顾蹒跚跌倒，他只是想去阻止黑尔那个愚蠢的家伙吗？不，他想挽回的是若干年前名叫雷的那个年轻人，他的种种冲动种种梦想，它们统统在这具年过半百的躯体前一一闪现，逐一破灭。当雷跑到大路旁边，迎头走来喜气洋洋的黑尔，黑尔说：

“内儿不是傻瓜，她并不要求我娶她。是我要娶她。我要安身立命，生儿育女。”

舍伍德·安德森接着写道：“雷·皮尔

逊也哈哈大笑。他觉得像是在嘲笑他自己和全世界。”

《没有说出口的谎言》，其实是雷这个老男人的故事。我第二次读到这里，在黑尔喜气洋洋的人生理想和雷的笑声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突然觉得读懂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完全读懂了：每个人都是满心欢喜地奔赴毫无意义的人生，如此而已。其实人生不过是像雷这样的苦力长工罢了，一切的悲剧亦不过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困扰——希望、梦想、欲望，不过是命运手上的肥皂泡——开个玩笑罢了！当雷开始嘲笑自己时，一切道路都直指毫无意义的漫长人生之旅，而那个虚构雷的人正站在不远处，他充满同情，但是和笔下的人一样无出路，共同承受生命的黑暗

和虚无。这是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之最伟大处。

后来，当我读到索尔·贝娄（Saul Bellow）笔下可怜的赫索格教授，十九世纪的故事分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复活了，人们还在奔赴看起来很美婚姻。他们永远被自己的欲望所惩罚。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相信，再也没有比《没有说出口的谎言》更平静、更残酷、更悲痛的小说了。或许现在也是。生于1876年的舍伍德·安德森曾经作过报童、油漆工，有着丰富的社会底层经验。1921年，身为油漆厂经理，但他心血来潮，扔下生意，跑到芝加哥献身文

学。已经足够开始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了，就像他后来在《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里说的，“我宁可写关于心灵和想像的、生活的书”。你看，心灵，想像，生活，都在这里。作为文学上的伯乐，他指点过海明威和福克纳——或者与其说文学上的伯乐，不如说人生的导师？谁知道呢。但我相信，文学上的这种关系绝非名人佚事。在那篇随笔《寻找父亲》中，舍伍德·安德森对插科打诨小丑式的父亲及其失望，直到有一天——然而，如何理解父亲，本身就是艰难的过程，对很多人而言，根本不曾有过那样一个行动而非训诫的一天。Q

“濯足”之后费思量



刘柠

2012年11月，阔别四年半之后，重访日本。时值野田佳彦解散众院，内阁总辞，国政选战正酣之际，媒体上很热闹，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情绪。可环顾四周，却丝毫不感受不到这种情绪的扩散，人们照样吃饭、喝酒、散步、赏红叶。晚间，绵延的食街照例间间爆满，一席难求。看到那种火火的氛围，瞬间便会明白，两国政客和无良媒体炒作的所谓“同仇敌忾”说，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与描述，毋宁说是带有某种明确倾向性的诱导与夸张罢了。

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仍然相信日本市民社会的成熟。毕竟，一个经过战后近七十年和平建设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繁荣国家，是不会轻易为某种邪恶势力绑架的。在这个经济主导一切的全球化时代，你尽可以说笔者“Too simple, too naive”，但我确实不知道，除了寄望于自由主义媒体所代表的健全的理性及其背后的人文主义价值支撑的话，以肉身之人，

面对强悍的国家，到底还能指望什么。

3.11震后，我确实看到了日本文化之力（或曰“软实力”的力量）的某种呈现。那种战后高速增长期时形成的、以美为师的高消费文化，本质上与东洋传统并不接地气，原本就难以为继，已日益呈露边界，3.11一劫恰好构成了转型的契机：我甚至觉得，日本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不出十年，这种在方向与价值上迥异于战后“主流”的文化，势必蔚然成大观。届时，一个更加低熵、绿色、高效的，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东西方文明界限的、更加融合的，更人性化、更富于可持续性的文化将粉墨登场，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辐射正能量——我对日本有这样的信心。

中日两国作为一对永远不会搬迁的邻人，宿命般地相伴相随，生生世世——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无需诠释的常识。然而遗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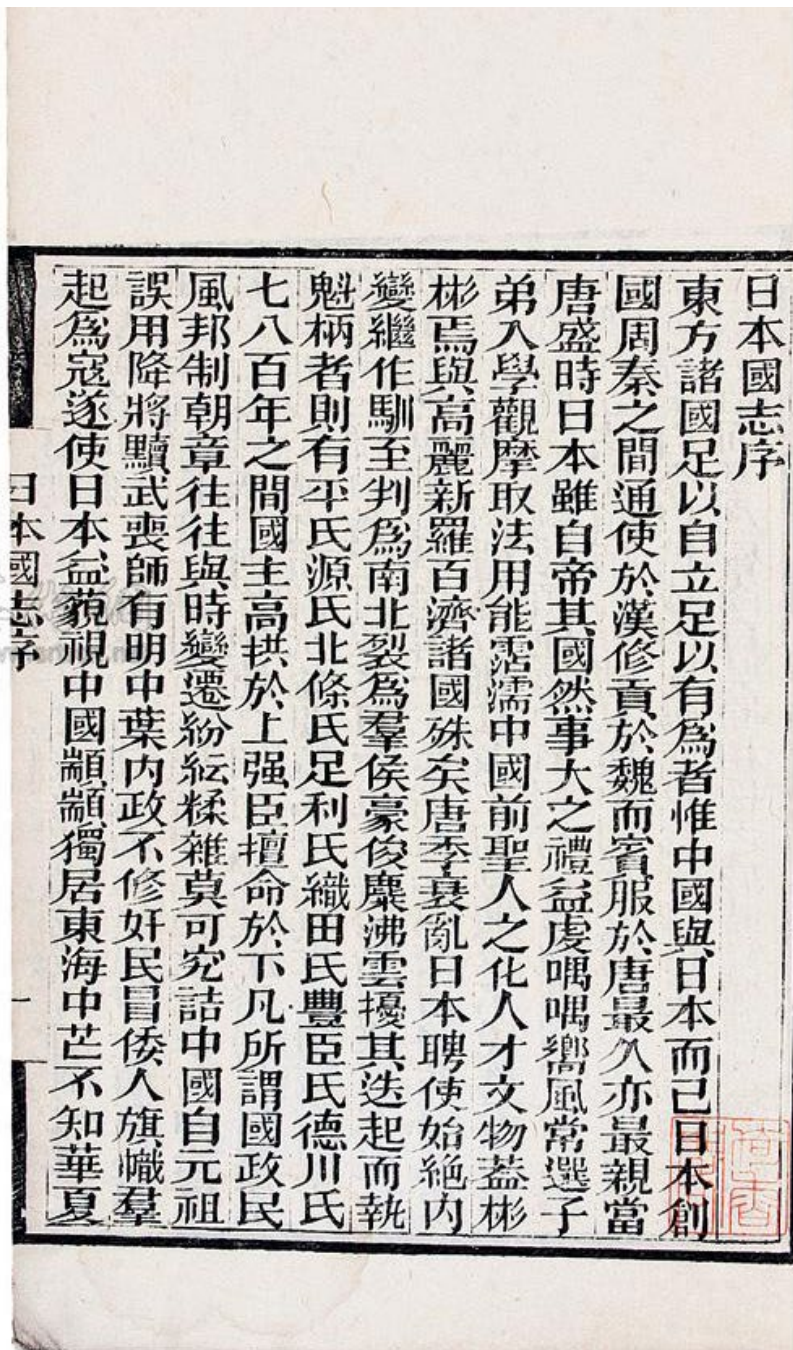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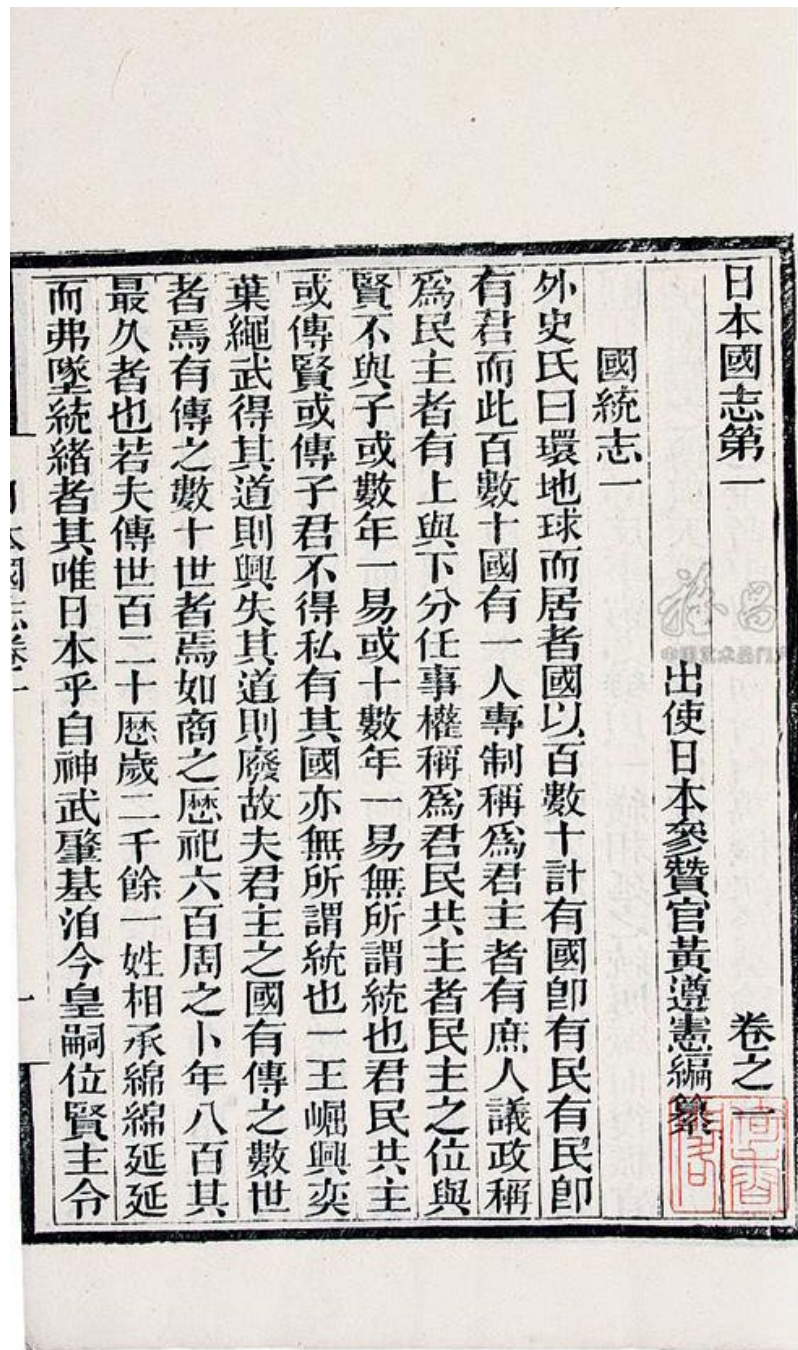
是，就在刚刚过去的邦交正常化的“不惑”之年，中日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颠簸，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尽管对现状的判断，见仁见智，但中日关系面临结构性障碍，需做方向性调整，则不失为各方共识。但无论两国官方关系如何修复、改善，若没有牢固可靠的“底层结构”的话，怕终究难以支撑起摩天大厦——这种认识理应成为共识中的共识。而所谓“底层结构”，无非是两国国民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去组织化、去精英化的，个体对个体、草根对草根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纵然无法断定这是不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充要条件，但它

无疑是必要条件。知易行难，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自从20世纪初，踏上日本问题、中日关系研究的“险途”，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十年。1877年，作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的黄遵宪赴日前夕，在自己的半身照上挥毫题赠友人，难掩踌躇满志：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
诸公未见靴尖趂，待我扶桑濯足来。

使日期间及归国后，赋《日本杂事



诗》、著《日本国志》，不遗余力地对国人普及日本知识，而终于未果：在《日本国志》杀青后不到十年，便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求和，被迫割地赔款。蒙此奇耻大辱，痛定思痛，梁启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国人对《日本国志》之无知，甚至对著者黄公度不无微词：“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梁任公言或有夸大其辞之处，可相对于日人知中之翔实，国人对日本之无知、无识、不屑一顾也真够离谱。对此，黄公度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之精英，深有体察。他指出：“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于是，奋起著书立说，为国人普及东洋之学，责无旁贷。

百年后，历经战后重建和“改革开放”，虽几代精英负笈东（西）洋，“濯足”归来，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有多少进步呢？最近的一次检阅，是在2012年秋天的反日运动中……夫复何言！而这种状况，恰恰构成了笔者不懈关注日本问题的动力之一。

毋庸讳言，包括黄公度在内，对日本的关注，皆因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



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因此，其编写《日本国志》，系统介绍日本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国势资源和制度律法，正是为了“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以明治维新为镜像，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

百年倏忽而逝，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沐欧风美雨，“濯足”东洋，学成归来，投身于时代洪流，饱受淬炼，有的甚至焚身碎骨，却终未能改变天朝坚硬的现实，至今未通过“历史三峡”（唐德刚语）。对历史详加检讨，会发现，路径、方案并非完全付诸阙如，更多时候，是选择机制出了问题。譬如，1847年，魏源出版了开创中土西学之滥觞的著作《海国图志》，可在国内却少有人问津，更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印数仅数千册。不承想，四年后，随一艘商船入港长崎，却被日人视为天照大神赐与日本的礼物，如获至宝。数年内，翻印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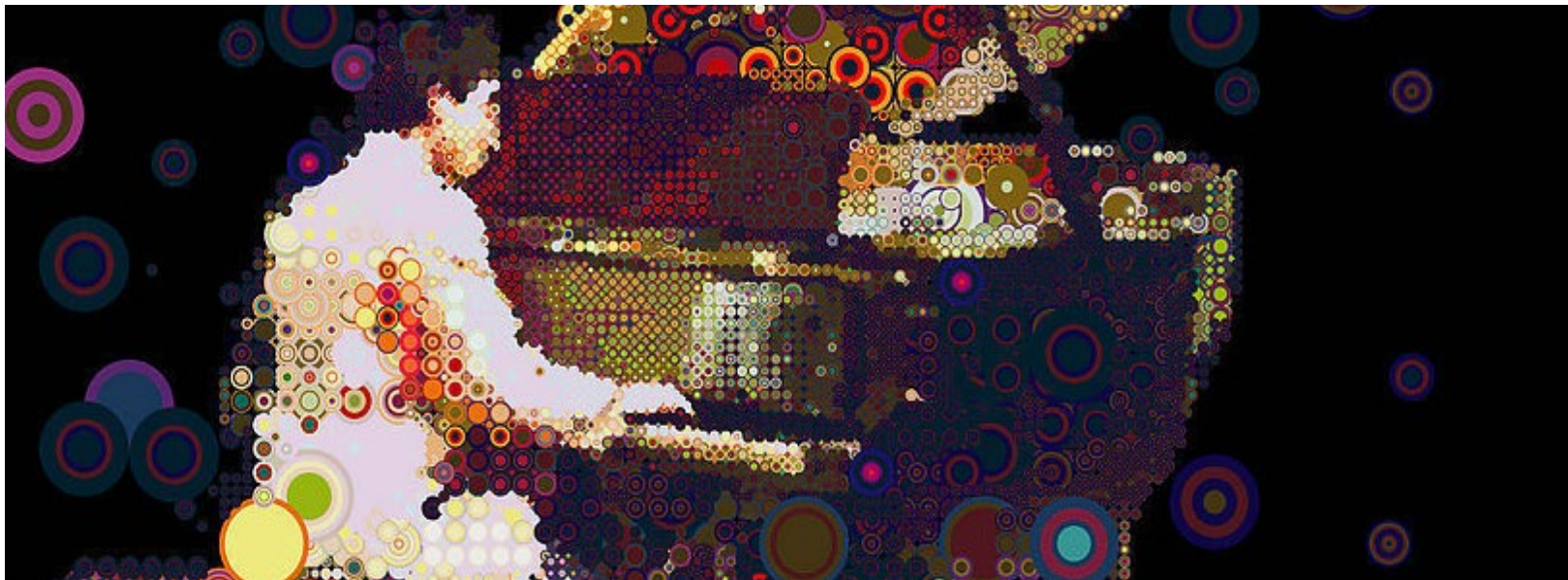
版，书价飙升三倍，对维新派思想体系之完善不无推动之功。彼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中“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慨叹道：“呜呼，我与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黄公度历时九载，呕心沥血的五十万言巨制《日本国志》，从成书到付梓居然整整等了八年之久，直到1895年才获初版刊行。一部即使现在看来仍未过时，当时绝对跻身世界顶尖水准的东洋学著作，终于未能在两国交战（即甲午战争）前对国

人的日本认识发生影响。冷眼观史，其痛也夫！

而选择机制一旦出错，便会一错再错，痛失良机。这一点，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正因此，吾一向注重异域经验和感受（所谓“濯足”的思考）。但同时，基于某种源自本土和当下的问题意识，对“濯足”之后的实效尤为看重。否则的话，人家的花园永远是人家的，我们所秉持的，最终只有暧昧的“中特主义”而已——那“濯足”还有多大意义呢？

钢琴家语录



马慧元

2012年某期《钢琴》杂志中有篇访谈，谈话的是钢琴家、钢琴老师巴巴扬(Sergei Babayan)，话题主要和钢琴比赛有关。

采访者说到有些钢琴比赛为大家选择了“正确”的获奖者，比如索科洛夫、普莱亚等等。而对那些被人遗忘的获奖者，怎么看？他的回答是，首先，希望他们不要在不成功的时候放弃。这句话打动了我这个读者，因为我非常相信它。有时获奖者后来的事业并不好，我们回头看去，可能怪评委没挑对人。其实，事业失败不一定是因为“本来就不该得奖”，甚至也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有时真不好说，人生有起伏，不可能总幸运，这本来就很常见。他又说，如果你喜欢，就要一直坚持，不要因为没有演奏会而放弃。

关于演奏家成名的偶然性，这里插两句闲话。著名乐迷张克新先生的一篇文章《香港前线报告：古典音乐家的沉浮》中

提到小提琴家克莱默在一场和喜剧演员同台的演出中讽刺那些以搞怪来吸引眼球的古典音乐家。我读后想的是，话说世上的事情，只要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开始分裂。有了教会、信仰，也就有了伪善；有了圣人就有了大盗；有了高雅艺术也有了一套虚伪矫情；有了古怪的艺术家也就有了装清高的欺世盗名之徒——这么艰险的古典音乐界，如果装装怪人就可出名，何乐不为？古典音乐会虽然有一定的慢热性，毕竟还是给人看（听）的，期待现场的反响，更甭提背后还有社交、虚荣等等一堆甩不掉的东西。它和世上别的职场也有类似之处，不可能完全公平并揭示真相。假如说有什么胜利者的话，那就是享受坚持、无怨无悔的人。

关于老生常谈的音乐比赛得失，巴巴扬说，比赛让人学会控制力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集中能力，以及一定量的曲目。“不幸的是，这都是演奏家的必须。”“我用了



‘不幸’这个词，因为这都不是真正的音乐因素。真正的音乐意味着人性、忠实、天真、想像力和敏感。”

我不由微笑，他说的这些因素，正是音乐家“运动员”的一面：坚毅、能控制、有体力，不怕人。不幸的是，演奏家都是“运动员”，有人音乐性高一些，“运动性”差一些——甚至古尔德也算，耐力以及忍受众人的能力都不行，按传统的路子，不大能成为舞台上长期成功的演奏家。而舞台经验和“运动能力”，跟音乐性确实既合作又打架地缠绕，它的瓶颈捆住了很多人的手脚。这样说来，现场演出和体育比赛也略有共性：一旦犯错就无法挽回，很多优点无从展示。当你探索音乐中的新可能的时候，背后漫长的思考、辨析如果不能当场让听众感受到，则好像做出高难动作但从器械上掉下来的体操选手那么令人遗憾。

有时我倒更相信录音。虽然它也有各种欺骗性，但它展现了演奏家最好的瞬间，能够中和掉“运动性”的缺陷，吸纳一定的探索过程。

那么，艺术家的真正激情在哪里？是不是和听众分享的愿望？他说，“对我来说，和听众分享也并没那么重要。我不是为现场的观众，而是为心中那个‘理想’的观众而弹。”我的读后感则是，古典音乐虽然怎么说也是“娱乐”的一部分，但应该有那么一点独立性，它取悦人，但不一定立刻取悦眼前的人。音乐消失后，关于它的回忆、品味久久不灭，这就是它的尊严了。Q

那些沉默的书局



成庆

搭乘的士穿过熙熙攘攘的重庆南路，司机突然伤感地告诉我，这条街曾经书店密布，如今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沿着重庆南路寻访，虽然仍能感受到昔日书市繁盛的情景，但已掩饰不住日暮西山的气氛。历来在读书人中享有盛名的台湾商务书局里冷冷清清，据闻不久要重新装修，不知未来是否会因装修而改变命运？三民书局仍然是这条街道规模最大的书店，但其景象，也隐隐透出实体书店的颓势。最近看到报道，这条路上全盛期的百余家书肆如今只剩下二十家，实体书店的消失，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魔咒。

在重庆南路及其附近的区域，除去一般书店，还隐匿着不少佛教书坊，或销售，或免费流通各种佛教书籍。这些书肆大多隐藏在二楼甚至住宅楼的高层公寓里，非知情者难以知其踪影。

为何有众多的佛教书店隐身此处？这不得不从当年天地玄黄的历史大变局说

起。国共内战，大量江浙僧侣遂随国府迁徙来台，但在当时，因日据时代的影响，佛教中心并不在台北，而在日殖文化更为浓郁的台南。而代表汉传佛教的江浙僧人为求自活，并欲改变台湾佛教的格局，陆续在台北购地安居，其中尤以善导寺为代表。国大代表李子宽居士与孙立人之妻孙张清扬筹款购下道场，并礼请汉僧主持，善导寺遂成台湾佛教重镇，白圣长老、印顺长老等大德都曾驻锡于此。

也正如此，围绕着善导寺，也陆续出现一些道场精舍，例如一直弘扬华严宗的华严莲社，当年就是在附近的济南路购下土地慢慢发展为今天的格局。但因此地为市区中心，并无太多多余土地供寺庙道场扩张，又加上这一带原本在日据时期就有不少书店，故许多道场或一般的居士组织为流通经典的便利，则多在此地设立印经流通处。如大名鼎鼎的佛陀教育基金会、白马精舍、大乘精舍等等。



在一栋极为平常的住宅楼里，我们搭乘电梯找到大乘精舍，从外观来看，与普通住家并无太大差别，里面则根据需求重新作了改建。我与友人在经书架前驻足浏览。平心而论，经过几十年的出版流通，台湾的佛典出版已经过了高峰期，大部分印经社也只是勉强维持运转。但对于我等陆客而言，却仍能有不少的惊喜。

台湾佛典的出版流通一般可分为现代的重新排印校点本和民国以前的影印刻本两种，前者流通数量大，后者则因是传统刻本形式，故收集者较少，但此类刻本在大藏经尚未数字化的时代，可谓是流通的唯一形式。

回溯台湾佛教的出版流通史，当年以影印流通《日本大正藏》为开端，台湾佛教界兴起了一波翻印流通典籍的热潮，除开

一般常见的佛经，还有当年僧人居士南迁携来的各种经论刻本。这些刻本要么因此岸劫火而被付之一炬，要么则因未得善加保管流通而难寻觅。正因为这样的历史因缘，这些印经处所承载的使命则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同行友人从书架取出一本书告我，此书有趣，坊间难觅。细细一看，这是民国时期日本净土真宗僧人小栗栖香顶在北京所作的演讲，汇集为《白话真宗十讲》一书，此书虽于义理上并无可观处，但里面所记录的许多历史细节颇为珍贵。如同清末民初许多曾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学者文人面对清末衰败景象的失望心情一样，小栗栖香顶也对中国佛教的腐败极为痛心，“观支那之佛教委微不振，不啻不力，学亦不能布教，但法灭之时至矣。”民国时期，日本佛

教曾在中国有大规模的弘法活动，从此书记录来看，当时日本佛教界前来弘法的动机，有相当部分是出于佛教的危机感，故小栗甚至还有“支那日本印度三国同盟”之提议。

对于一般的佛教徒，这本小册子的确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这本小书却散发出令人着迷的味道，因为僧人的观察在历史叙述中大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是边缘、出世且被认为是消极的。但这本小册子却透出一种强烈的弘教热情，这种宗教热情其实一直潜藏在中国的佛教传统中，例如玄奘、鉴真，只不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这样的热情难免显得陌生与难以理解。

挑选了几本书后，我们与负责精舍的居士告别，前往另外一家离重庆南路稍有些距离的佛教书局，之所以去寻觅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局，其实只是为寻找一套《藕益大师全集》，这家书局在80年代曾以刻本影印的形式出版流通了这套20余册的大部头。按照地址找到门牌号，却只看到一楼的佛具店，店主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才打开一旁的铁门，原来，位于二楼的书局无人值守，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来专程购书吧。沿着楼梯走上二楼，转角的阴暗处挂了一块极小的的铭牌——“佛教书局”。

这个小书局由两位僧人创办，所出版流通的书籍与其他家也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如果不是为了藕益大师的全集，想必我也不会专程来此寻访。他们流通这



些经典的目标只是单纯地相信他们有价值，所以尽管他们沉默，但是他们却一直存在着。这就是台湾佛教小书局的缩影，他们隐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虽然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却仍没消失。大多数这样的机构，是由出家众或居士主持，而且还有信众义务地加以护持，这使得他们能够多少不必考虑商业规律，而能存活在城市巷陌之中。

回到上海，我时常想起这些小书局。想起他们不是因为感伤，而是他们的从容。他们的坚守无关乎商业，而只在于他们相信这是有价值的，所以并不会嗟叹，他们只是在坚持自己的某种人生信念而已。

有时想想，如果这个社会是一片漆黑，其实并不一定是缺乏“正义的探照灯”，而往往是很难找到这样微弱的信念灯火。🔴

简·奥斯汀的骄傲



罗四鸽

简·奥斯汀有没有遇到她的达西先生？这无疑是写了《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汀，最引发后人无数罗曼蒂克幻想的地方，比如2007年由大嘴美人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电影《成为简·奥斯汀（Becoming Jane）》。除开一个快乐的大团圆结尾外，这部电影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奥斯汀版的“傲慢与偏见”。电影中，傲慢的汤姆·勒弗罗伊引起奥斯汀的偏见，最后两人消除傲慢与偏见，决定私奔。私奔到半路上，奥斯汀发现汤姆为此将失去他的所有，甚至无法供养他贫困的大家庭，于是，“理智”中断了这次私奔。从此，奥斯汀为情所伤，终身未嫁，写着有着快乐结尾的小说，若干年后，终于成了著名的作家简·奥斯汀。昔日恋人汤姆则成了大法官，两人偶相逢，眉目传情，依然胜过人间无数！可惜，据学者考证，这段好不罗曼蒂克的爱情，只不过是编剧的罗曼蒂克，在奥斯汀的生命中，这只不过是一段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的插曲。汤姆·勒弗罗伊是奥斯汀邻居的侄子。1796年1月，在爱尔兰都柏林上学的汤姆来到汉普郡的叔叔婶婶家度假，与20岁的奥斯汀相识。在奥斯汀看来，这位年轻帅气的汤姆“完美无缺，除开一个时间会完全消除的缺点：那就是他的晨衣太紧了。”和所有陷入初恋的少女一样，奥斯汀变得幸福而敏感。然而一个月假期之后，汤姆回爱尔兰了，从此两人未再见面。一年后，汤姆投身法律界，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律师，并于1852-1866年任爱尔兰大法官。据说这位老法官后来承认，他确实喜欢过后来很著名的简·奥斯汀小姐，不过，他把这份爱恋“归结为男孩子的淘气”，汤姆比奥斯汀还小一个月。1798年，汤姆与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姑娘订婚，并于第二年结婚。1798年11月，已经订婚的汤姆再次来到汉普郡拜访他的叔叔婶婶，奥斯汀在给其姐姐的信中写到，汤姆的婶婶曾来拜访，她的邻居“一次也没有对我提

起她爱尔兰侄子的名字，而我太骄傲了，也不愿打听。”因此，我更愿意相信2007年另一部不怎么罗曼蒂克的奥斯汀的传记电影《奥斯汀小姐的遗憾》(Miss Austen Regrets)》，在这部电影中，年届四十的奥斯汀给她27岁正在愁嫁的侄女提起了汤姆·勒弗罗伊，其目的只是为了告诉她的侄女：听到汤姆另娶他人，我只受伤五分钟，然后就过去了。现实且精明的奥斯汀甚至理智地告诉她那对爱情想入非非的侄女：邂逅达西先生的唯一方法是虚构他。

那么，简·奥斯汀究竟有没有遇到达西先生呢？学者约翰·哈普林(John Halperin)在其严肃的学术论文《简·奥斯汀的情人》中，通过通信和回忆录，考证出12位与奥斯汀相逢过的绅士，然而细究之后，大都在爱与被爱之间，其深度和长度均未超过初恋汤姆，只有1801年夏天出现的一位乡村牧师似乎与奥斯汀有结成秦晋之好的可能。三个星期的假日过去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位牧师会回来向奥斯汀求婚的。然而，根据奥斯汀姐姐卡珊德拉的叙述，他们等来的却是这位牧师去世的消息。奥斯汀从1801年至1803年三年间的信件全部被卡珊德拉烧毁，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上是一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之后至少有两位绅士向奥斯汀小姐求过婚。BBC的电影《奥斯汀小姐的遗憾》正是以一个求婚开始：1802年12月，奥斯汀的邻居、21岁的哈里斯向当时已27岁的奥斯汀求婚。奥斯汀答应了，然而第二天她就反悔。据考证，两年后，这位脆弱的有些平庸的说话还有



些结巴的哈里斯和另一位小姐走进婚姻殿堂，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五年半后的1808年6月，奥斯汀去拜访在肯特的哥哥爱德华·奥斯汀。在这里，爱德华的小舅子另一位爱德华向32岁的奥斯汀求婚。显然，经历过哈里斯求婚的奥斯汀已经知道如何“理智地”应付自己不爱的男人的求婚了。在电影《奥斯汀小姐的遗憾》中，这

位爱德华牧师表现如一位痴情男，一直不能忘怀奥斯汀小姐，甚至多年后看到奥斯汀与别人调情时，依然很不绅士地醋意大发，可惜的是，现实中这位比奥斯汀的小4岁的爱德华在当年秋天的时候，便转向比奥斯汀大两岁半的姐姐卡珊德拉求婚。结果谁都知道，两姐妹都拒绝了这种柯林斯式的求婚。这位向两姐妹求婚的爱德华牧师，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起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在向伊丽莎白求婚失败后，柯林斯第二天便向伊丽莎白的闺蜜夏洛特求婚。小说中，伊丽莎白拒绝了这位愚蠢势利却能继承她家财产的表兄的求婚，而与伊丽莎白同样聪慧的夏洛特却接受了这个求婚，并对惊讶的伊丽莎白说：“只要你空下来把这事细细地想一下，你就会赞成我的做法。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我绝不是那样的人，我只希望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奥斯汀写道：

“在27岁这样的年纪，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她从来就不漂亮。”

然而，有些漂亮有些骄傲的伊丽莎白看来，夏洛蒂嫁个柯林斯是“天下最丢人的事情”，显然，夏洛蒂只是为自己找一个储藏室。现实中，家境与夏洛特类似、一向理智的奥斯汀也拒绝做出夏洛特式的选择，如其对其侄女的忠告：“做任何事情，除没有激情的婚姻外”。最终，她让自己陷入孤独和贫困：在那个时代，女作家不仅不能养活自己，似乎还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1811年，35岁的奥斯汀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署名“By a Lady”。这部小说第一版大约卖出了750

到1000册。1813年再版的时候，奥斯汀告诉她的兄弟这部小说给她带来140磅收入，此时，她最著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已在1813年初出版。紧接着，她在1814年和1815年出版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其生前出版的这四部小说一共给她带来大约700磅的收入。在《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约翰将继母达什伍德夫人和三位妹妹赶出家门，每年只给他们500英镑。这500英镑只能让母女四人寄居在亲戚家的村舍中，勉强活命混个温饱，连一件参加社交的漂亮衣服都难以负担。可见，奥斯汀这6年



700英镑的收入是无法供养其同样未婚的姐姐和年迈的母亲的。在电影《奥斯汀小姐的遗憾》中，这便是奥斯汀小姐的唯一遗憾。为纪念《傲慢与偏见》出版200年，奥斯汀的肖像被印在今年新版的10英镑的纸币上，还真有些讽刺。

然而对于她的个人婚姻，选择单身的简·奥斯汀却骄傲地拒绝任何“sorry”，甚至来自她母亲的同情。因为对于爱情，奥斯汀小姐从未停止过她的激情。40岁的时候，不断发生姐弟恋的奥斯汀喜欢上了她哥哥的内科医生、29岁的海顿先生。在给姐姐的信中，她形容这位年轻人“介乎男人与天使之间”。当然，这依然是一段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插曲，奥斯汀“理智”地结束了这段感情。

一年半后的1817年7月18日，简·奥斯汀去世。在四天后的讣告中，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并第一次与四部小说的作者联系在一起。其去世后，她的姐姐卡珊德拉烧毁了奥斯汀与她的大部分通信。当她的侄女阻止她烧毁这些信件时，理智的卡珊德拉抬头问她的侄女：“你依然相信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个秘密的爱情故事吗？”已做出夏洛特式选择、无奈嫁给一位有六位孩子的鳏夫的侄女回答说：“是的，我依然希望有一个。”

在其日记中，简·奥斯汀写道：“只有理智与感情、傲慢与偏见之间的生命才值得书写！”这或许才是简·奥斯汀成为作家简·奥斯汀的原因吧。Q



划桨的人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